

□丁兵康

官塘融光笛声长

融光桥就是老柯桥人口中的“大桥”。远远望去,这座藤蔓飘飘、伟岸轩峻的石拱大桥,宛如一位气度非凡的美髯公。融光桥之名与一座寺院有关。明朝以前,该桥的西南侧曾有接待各地云游僧人的“柯桥接待院”,后改为“灵秘院”,明正统十二年(1447)赐额“融光寺”。时“侍郎王祐请敕大内,适日光映御袖,赐名“融光””。三四十年后,“成化间复建桥,为“融光桥”,更以寺名也”(孙伟良《话说融光寺》)。相比“大桥”,“融光桥”是不是更有料更有味?但若以桥的体量和重要性而论,则“大桥”好像更直接明了些。

“大桥”在老柯桥究竟有多重要?只要踩着石级走到桥上,前后左右一转悠就知道。“大桥”横跨萧绍运河,联通了老柯桥的南、北两大片街市。桥南大片街市的尽头处,往下穿越104国道,通往柯岩的上市头;桥北直通管墅、华舍的下市头。桥的南侧圆拱内是穿拱而过的官塘。桥的东首,南岸是东官塘上岸,北岸是东官塘下岸;桥西首的南岸和北岸,分别是西官塘上岸、下岸。上市头和下市头、东、西官塘的上、下两岸,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民居。站在桥上,看得见各式瓦房和运河边骑廊内的巷弄、台门。东官塘下岸的尽头处是纪念蔡邕的古柯亭,西官塘上岸的尽头处,是同样横跨运河并有官塘穿拱而过的太平桥以及纪念阮籍、阮咸叔侄的阮社。如此看来,融光桥是不折不扣地处于水路要津、商道核

心,雄踞在老柯桥的C位。

“大桥”之“大”,则是与它近旁的两座桥比较而言的。融光桥与当时的融光寺之间隔着一条柯水。从南面柯岩方向下来的柯水,在融光桥西侧与萧绍运河呈十字形交汇,上面有两座体量较小的桥;南首的那座是联接古镇西南片的“柯桥”,其最初建桥年代要比融光桥早好几百年;北首是建于清代、联接西北片的永丰桥。这两座桥在柯水之上南北对视、且暮守望,东边运河之上的融光桥则与它们共浴晨曦落霞、共听江流风吟。三桥之上过客匆匆,轻尘飘舞,三桥之下棹楫穿梭、云水激荡,细雨湿流光,花开花又落,这三“桥四水”不知见闻了多少人间悲喜!

二

融光桥下那条穿拱而过的官塘,即是柯桥一带的古纤道。古纤道是唐元和十年(815)观察使孟简主持疏浚运河时增修的一条土堤,至15世纪末的明弘治年间重修时改为石砌塘堤,此后历经数次大的整修,才有了今日这般模样。塘堤或傍岸而筑,或临水而建;或从河床垒砌而上,或遇村头河口架桥,全长50余里,每一次的修缮都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。修筑塘堤的目的,既为水利防洪,更为行舟背纤。而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眼里,这“白玉长堤”,这“长虹卧波”,还有纤夫和艚公的号子,两岸的千重稻浪,烟雨迷濛里依稀可见的楼台,都是江南水乡绝妙的风景。人生只合江南老,一律氤氲入诗囊。

为什么古纤道在柯桥一带被称为官塘?这与该处塘路的特殊地位有关。柯桥自东汉以来即设有亭、驿、馆、署等官方机构,宋、元以后人气、商气日盛,这主要还是依托了水运之便,家住镜湖三山的陆游就常常“挟舵柯桥”;明、清以后,随着运河塘堤的不断整修,更利舟楫往来、物资集散,如此,纤道的作用益增。“官塘”之称在清《嘉庆山阴县志》中即已出现:乾隆二十一年(1756),“详请白洋(今安昌)巡检移驻柯桥”,在“柯桥西官塘”设巡检署。而柯桥官塘的高光时刻,自然是康、乾两帝的“翠华临幸”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玄烨帝第二次南巡时途经柯桥,在东官塘下岸的永丰坝旁“御驾亲临放生”。乾隆十六年(1751),弘衍帝在赴会稽祭禹途中,御舟抵临古柯亭,在柯桥游历、寻访,运河及官塘之上桅樯林立、冠盖如云。随后,弘衍帝作《题柯亭》诗一首。诗写得并不太好,但凭着诗中对蔡邕和柯亭笛的不吝褒扬,柯桥人就该记着它!

三

柯桥曾称笛里。柯桥与东汉末年的文化大匠蔡邕的缘份,始于他的避难江南、夜宿柯亭之观、取椽竹为笛而 its声独绝果有异响。此后,蔡邕和他的柯亭笛便一直活着,风雅着,笛声悠扬,文脉流长。

三国时的高士、山东人管宁曾因仰慕蔡邕来到柯桥,筑室而居,留下不少佳话。时任魏国司空、太尉的华歆因欣赏管宁的才德而特地寻来,劝他人朝为官,

并愿将太尉一职让给他,但一时无法说服,便也就近筑室而居。对一个相知老友期许,竟如此执着、如此深情!后人遂将两人的住地分别称为管墅、华舍。

东晋大将桓伊善吹笛,“有柯亭笛,常自吹之”,其妻乃蔡邕之女文姬的后裔。王徽之(王羲之五子)久仰桓伊的笛曲《梅花三弄》而素未谋面,闻桓路过,即请一奏。时为朝廷重臣的桓伊马上下车,“踞胡床,为作三调。弄毕,便上车去。客主不交一言”(《世说新语》)。子猷与子野,一个率性不羁,一个潇洒自如,一次默契无痕的神交!

西官塘上岸太平桥附近的荫毓桥上,石拱圈的两壁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:“一声渔笛忆中郎,几处村醅祭两阮。”从近处官塘的整修时间推断,这个字迹模糊但词义清晰的联语大约出于清光绪年间;而从内容和场景来看,这副妙对更是传达了柯桥人对蔡、阮等文化名士的情感认同和敬仰,其精神内核触及到了柯桥文化的根与魂,柯亭笛的传奇、官塘边古柯亭的修建以及阮社、管墅、华舍的命名等,都可视为同类。在这运河之滨、官塘之侧,蔡邕的柯亭笛吹奏出水乡渔歌,并与两阮的竹林村酒相映交融,令人心俱醉;而这“忆”与“祭”中,仿佛还留存着蔡邕、阮籍等愤世伤时的怨叹和遗世独立的风骨。当年,蔡邕那声如裂帛的笛鸣与阮籍穿山破谷的长啸,是否在此形成了共鸣与合奏?汉末风雅与魏晋风度是否早已魂系江南、瓜瓞绵延?

□张勇

□朱辉

鞭靴与金玉

陆贽是史书里的清官,有学者甚至将他评为“大唐第一清官”。然而他在民间知名度却不高,如今的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他。

古代清官中,能断案者往往被广为传颂,比如包拯、狄仁杰。虽然断案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,但老百姓喜欢听故事,所以这类清官很容易成为知名清官。再有一类清官曾主政一方,有过突出政绩,比如西门豹因为治理了邺地水患,虽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员,距今十分久远,至今依然妇孺皆知。相形之下,更多的清官因为没有具体而又精彩的“故事”,极少被人谈起。

陆贽是唐代宗大历八年(773)进士。唐德宗即位后,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。他一生坚定地追随唐德宗,“还原兵变”后,随唐宗出逃奉天。危难时刻他起草的诏书,情词恳切,“虽武人悍卒,无不涕泪激发”。

正因为有过过命的交情,唐德宗对他十分信任。逃亡时陆贽曾失踪过一阵子,唐德宗为此痛哭流泪,出千金寻找他。陆贽后来位极人臣,官职相当于宰相,但一直清廉自守,不收别人赠送的一针一线。

贞元三年(787),陆贽的母亲去世,陆贽回老家守孝。官员们借机纷纷赠送厚礼,多达几百份,陆贽一一辞谢。至于平常日子,给他送礼就更难了。据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》记载:由于给陆贽送礼遭拒,许多官员竟然去皇帝唐德宗那儿告状。唐德

宗竟然也觉得陆贽“清慎太过”,私下劝告陆贽:“卿清慎太过,诸道馈遗,一概拒绝,恐事情不通,如鞭靴之类,受亦无伤。”但陆贽怼回去了,他说:“贿道一开,展转滋甚。鞭靴不已,必及金玉。”意思是一旦开了口子,收取一些小礼物,那么时间久了,必然养成习惯。贪欲会越来越强,早晚会收取贵重的贿赂。

陆贽的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。多年前我被单位派往外地经营部做财务,同时兼做内勤。经营部员工包三顿工作餐,食材都是我采购的。经理曾说他知道买菜不可能不“打夹账”,不过顶多也就搞个几百块钱,没必要深究。同事们也认为我肯定会搞点小好处,毕竟买菜没有发票,花了多少钱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除非傻子,这么好搞谁不搞?

承受洗不清的“不白之冤”,干脆弄点小钱,免得白背个名声;还是坚守底线,不贪一分钱?我做过思想斗争,幸亏读过陆贽抗拒贿赂的故事,坚守了清白。多年以后,单位里有多名领导由于贪污被判刑。我很庆幸当初没有“以歪就歪”,不然培养出贪欲,在那个“高危”岗位上,说不定也会沦为犯罪分子。

按照法律,贪那么几十、几百块,达不到入刑标准,但我们绝不能用最低标准要求自己。相比于许多清官的大事迹,陆贽不受“鞭靴”对于现代人更有警示意义。世上所有的贪婪,都萌芽于最初小小的贪念。

面子

驳皇上的“面子”,结果就是“你驳我面子,我要你脑袋瓜子”。虽然唐朝那个魏征屡次驳过他老板的面子,那可是个极特殊的情况,是人家李老大看魏征顺眼,老魏才成为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这样的幸运儿屈指可数。

鲁迅先生曾称“面子为中国精神的纲领”,就像有清一代的辫子,抓住了辫子,一身就得跟着走。据鲁迅讲,前清时候,洋人到总理衙门(犹今之外交部)去要求“利益”(无非是割地赔款),一通怒骂,吓得大官员们满口答应,但临走时,却被从边门送出去。不给他走正门,就是让他没有面子;洋人既然没有了面子,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。割地赔款是小事,反正中国地大物博;面子问题事关国体,则马虎不得。

相比之下,老外似乎不太在乎这个。中学的课本里,有一篇《爱因斯坦与小女孩》的课文,是这样描写爱因斯坦的:“老人蓄着一撮短而硬的小胡子,一双棕褐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,长着一头蓬乱的灰白头发。他一边埋头走路,一边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冷

不丁被小姑娘一撞,他抬起头,友好地冲女孩一笑:‘对不起,小姑娘,是我不小心。’说完,又低头向前走。女孩望着老人,只见他穿的衣服又肥又长,整个人就像裹在一张大被单里,脚下趿拉着一双卧室里穿的拖鞋。‘嘿!这个家伙就是从我的童话故事书里走出来的。’小女孩这么想。

回到家,她将碰到这老人的事情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后兴奋地说:‘孩子,你今天撞着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他是爱因斯坦!’女孩直纳闷:这个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的人,怎么能是‘最伟大的人’呢?”

爱因斯坦肯定不注重面子,不用刻意地把自己装成什么样子,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有几个人能够取得爱因斯坦的成就呢?正是因为他内外的一致,所以他不需要装什么,也就用不到面来充当门面,而坦诚、本真地面对一切。

面子关乎尊严,应该要,但不可太过,尤其是,要认清该要的是什么样的面子,切不可因面子问题搞得自己太装,否则,就只能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了。

屋脊上的花

下,俯仰相承。瓦上生雨烟。雨水打在瓦上,呈一朵花状,玉珠飞溅。瓦在没湿时是灰瓦,粉墙灰瓦,屋宇之下,住着寻常百姓人家。这时候,密密细瓦上迷蒙一片,瓦上烟就是水墨,一点一点在宣纸上濡染。檐口衬托着一行垂挂的白辛夷花,枝上蹲着一只鸟,细细密密、若有若无的烟,从瓦上蒸腾而起。

房屋是现实的,屋顶是精神的。屋脊之上的花,自然是一个园子的点睛之笔。老房子的白色辛夷花,高过山墙屋脊,它们举着一盏盏小酒杯,在向这个春天致意。

一棵树,站在山墙下,花朵满上是向上的情调。此时辛夷果正是盛花期,却仍有几朵尚未绽开的花骨朵儿,如蘸水后没有泡开的毛笔头指向天空。辛夷映衬花格木窗,整个树形如女子的一绺长发,柔顺垂下。垂下的花枝又似一袭重瀑——花朵组成的瀑布,幽香阵阵,整个一大片在风中微微晃动。

有辛夷的俊俏花枝,给古老的园子带来不一样的亮色,旧门窗上风吹过的痕迹与倒垂而下、晃在眼前的白辛夷,提醒人们又到了一年的春天。还可以从窗子里欣赏白辛夷。李渔说,窗子是房子的眼睛。透过墙上

花窗,可以看见园子里白辛夷俟地挤在一起,站在那儿,簇簇一院子,把空间都布满了。园子像一只大的布口袋,又像一只大竹篮,装满了一园子的幽香清气。

为什么总觉得春天的辛夷适宜连同老房子的屋脊一道欣赏?那年春天,在扬州,我站在何园玉绣楼的二层小楼上,倚木栏杆,俯身向整个庭院观望。此时,院子里气候温润,草木含烟,一大片白色辛夷花布满整个天空,它们是那么孤独,又是那么高洁,悬在园子的上空,连同参差光线、斑驳花影,组成生动而唯美的锦簇图案。

多少年过去,只要一想起扬州,就想起何园房舍屋脊上的黛瓦,还有那一大片生动美妙的玉白色辛夷花。

屋脊之上的花,还有凌霄,花色是胡萝卜的黄,藤从葳蕤着碧绿,同样使屋脊生动,与辛夷有所不同的是,凌霄花是攀爬着的,而辛夷是浮着的,如浮在屋脊上的云,飘逸空灵,让人想到黄山云,飘浮在山谷里,是游动的。轻盈无骨的云絮,映衬山谷,而冷峻黝黑的奇松怪石,反过来烘托山窝里飘飘忽忽蒸腾的云。

屋脊之上的花,从别的枝上旁逸斜出,探过身来,衬托屋脊;屋脊也衬托花。

互相映衬,就像人与人之间。

□赵盛基

高山之巅点地梅

阿尔卑斯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,看上去亲密无间,其实充满了激烈的竞争,为了生存,它们使出百般招数抢占地盘。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的大自然生存法则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然而,在高山入云的高山之巅,这个法则似乎就不怎么适用了。山顶上气候环境极其恶劣,气温低下,寒风刺骨,山石嶙峋,土壤贫瘠,几乎寸草不生,自然就没有什么竞争了。山下那些忙着争夺地盘的花花草草宁肯在竞争中苟活,也不光顾此地。也难怪,身在繁华地,难喜

荒凉处?再说,它们也不敢或者没有能力登上顶峰。

令人惊奇的是,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却在这里蓬蓬勃勃地生长着,让光秃秃的山顶显露了生机。足见这种植物具有超强的生命力,它的名字叫点地梅。

点地梅,草本植物,卵形叶,伞形花,平铺地面,向四周生长。无论高山草原,还是河谷滩地,无论骄阳似火,还是冰天雪地,只要有一丁点瘠薄的土壤,它就能生根发芽,而且不需要帮忙,它的种子能够自播繁殖。

阿尔卑斯山顶的点地梅大都生长在几乎见不到土的石缝里,其中一株已经在这里生存了上百年。当年它登上让许多花草望而却步的山巅,扎下根来,默默成长,至今生生不息,散发花香。

独居高山之巅,孤单吗?不!点地梅的周围围绕许多朋友,细菌、昆虫……它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,自给自足,和睦生存。可见,只要是有能力者,无论身处什么环境,总是不乏追随者。

□王太生

梨园“往事”

近读白居易诗文,不觉想起关于杨贵妃与梨园的话题。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曾在梨园调教乐工、宫女演习音乐歌舞,后世便沿用“梨园”为戏院或戏曲界的别称。

梨园在何处?人们一直在探寻。上世纪末,在位于陕西临潼城南的骊山风景区,也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“春寒赐浴华清池”的所在地,兴修土木时意外发现了唐朝梨园遗址。这对于印证他们那段浪漫的“缓歌慢舞凝丝竹,尽日君王看不足”的生活,又获得了一个有力的证据。骊山以温泉出名,山秀林茂。唐玄宗携手爱妃于此洗罢温泉,再听歌舞赞,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然而,一般档次的“歌舞团”或许不能满足高层人士的享乐需求,再加上杨贵妃在歌舞技艺上是个行家里手,宋代乐史记载她“善击磬,拊搏之音冷泠然,多新声,虽太常梨园之妓,莫能及之”,因此,开个高级“音乐舞蹈学院”培养人才,不但合乎情理,也是“形势”的必然,于是有了梨园。

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有“骊宫高处入青云,仙乐风飘处处闻”之句,可见梨

园之盛况。“学院”的师资力量也相当充足,有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贺怀智,有能歌善舞的李龟年,更有妙弹琵琶的杨玉环。当然,大诗人李白也是这里写歌词的高手,就是因他爱喝酒、误事,又时常发小脾气,最后,看升迁无望,打了个报告想走,结果上边给了点钱,就“下岗”了。

贵妃杨玉环弹琵琶有手绝活,而且她的琵琶也非寻常之器。据说是一个叫白季贞的和尚从四川给她弄来的珍贵之物,材料用的是檀香木,琵琶弦还是进口货,叫“淩水蚕丝”。贵妃名气大,当时宫廷内诸王、郡主以及她的三个姐姐都争着拜师学艺,做杨贵妃的“琵琶弟子”。这样,梨园又增办了一个“贵族特长班”,规定要收高额学费,可全挤着往里钻。史载杨贵妃“每一曲彻,广有献遇”,教一支曲子,就有许多收入,看来这又成了美女杨玉环的第二职业,一笔大收入。

杨玉环晚生50多年的白居易,有幸遇到过一位梨园弟子“十三学得琵琶成,名属教坊第一部”。这位风尘女子“转轴拨弦三两声,未成曲调先有情”,可

见功底之精深。同时又能弹得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就知其技艺之高妙了。唐玄宗和杨贵妃作为梨园领袖,看来是严师出高徒。

封建君王,沉于酒肉,迷于声色,终于导致了一场社会大动乱,使人民身陷水火之中。而他个人也成了这一悲剧的牺牲品。因此,梨园的出现,“梨园现象”的泛滥,便应验了杜牧的诗句:

新丰绿树起黄埃,数骑渔阳探使回。霓裳一曲千峰上,舞破中原始下来。沉迷梨园,娱乐泛滥是个教训。杨玉环,貌美多才,但死得很惨,也很可怜。有许多人还怪她、恨她。清代诗人赵长龄说得公道:“不信曲江信禄山,渔阳鼙鼓震秦关。祸端自是君王启,倾国何须怨玉环。”可是,她的死,是否与她身为贵妃,又协助老公唐玄宗主持“梨园”工作时,泡温泉、演歌舞,幸福透支太多,整得皇上总度假不理朝政有些关系呢?如果,她除了陪伴唐玄宗娱乐,还能劝说夫君认真“工作”,关注民生,其结果可能就是别样风情了吧。